

“156项”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赵学军

摘要：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156项”在中国工业化、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外经济关系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学术界对于“156项”做了多角度的研究，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不足；整理、出版的“156项”的资料十分稀缺。搜集、整理“156项”历史资料是必要的前期工作，“156项”对中国工业布局的影响、对各行业发展的影响、对工业城市兴起的影响、在各行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等问题值得深入研究。除此之外，对于“156项”中企业、行业的发展变迁，以及“156项”在国家治理体制中的作用等也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关键词：“156项”；工业化；技术进步；工业基地

学术界俗称的“156项”，指的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苏联及东欧国家帮助下进行的150个重点建设项目。1955年颁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中央政府确定了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但在实施过程中，有的项目被合并，有的项目被撤销，最后完成的建设项目是150个，而人们已习惯上通称其为“156项”。“156项”集中在中国急需的煤炭、电力、石油、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医药、轻工、航空、电子、航天、船舶等14行业，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安徽、陕西、甘肃、内蒙古、云南、新疆等17省、自治区。“一五”时期，中国以“156项”为核心，以限额以上900余个大中型项目为重点，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1969年150个建设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中国史无前例地建成了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雏形。“156项”的完工，让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在能源、机械、原材料、化学等重工业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大步。“156项”是当代中国工业化的



赵学军（1968—），山西陵川人，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农村经济、金融体制

* 本文是笔者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156项’建设工程资料整理与相关企业发展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9ZDA224）阶段性成果。

奠基石，是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的里程碑。“156项”相关企业在6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有的重组，有的改制，有的关闭，目前还存在80余家，在各行业仍然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长期以来，因为各种原因，学术界对“156项”的研究比较薄弱，学术成果较少。现在，迫切需要搜集、整理“156项”的资料，深入研究相关企业的发展变迁。

一、“156项”资料整理与出版情况

由于各种原因，学术界整理、出版的关于“156项”的资料较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中央档案馆查阅了大批有关“156项”的档案资料，对其中的部分重要文件以专题形式做了选编，收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研的1953—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几个分卷中。《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的《综合卷》《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工业卷》等专题卷，分别搜集了关于“156项”的中苏协议、项目名单、项目投资情况、设备与技术引进、产能、企业生产管理等方面的资料，从整体上反映出“156项”的面貌。^①但由于各卷篇幅所限，收录的“156项”的资料十分有限。由于该资料来自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国家部委的档案，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学术界已出版的一部重要的专题资料汇编是董志凯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与156项工程》，该书选编了关于“156项”的政府文件、中苏协议、中央领导人书信与电报往来、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的指示等档案资料，当事人袁宝华、宋劭文、薄一波、江泽民、李岚清、江风、纪登奎、朱远明等关于“156项”的回忆录，以及部分专题研究。^②

随着中央有关部门档案的解密，中央档案馆公布了一批“156项”重要文献资料，发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上。该期期刊以25页的篇幅选载了《周恩来致莫洛托夫的信》《周恩来等致李富春的信》《中央关于计划设计项目协定内容、组织工作给李富春的指示》《中央关于中苏协定问题给李富春的指示》《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李富春关于与苏联政府商谈对我国援助问题的报告》《国家计委关于向苏联政府提出一些补充要求与修改意见向周恩来的请示报告》《国家计委关于郭维理所提问题的研究意见向中央的请示报告》《赫鲁晓夫致毛泽东的信》《中国政府请苏联政府增加设计和帮助建设某些企业的备忘录》等10份珍贵的文献。这些文献基本反映出中国政府在“156项”的计划、中苏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之《综合卷》《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1989；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之《工业卷》，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之《综合卷》《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工业卷》《财政卷》，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0、1998、1998、2000；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之《综合卷》《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工业卷》《财政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

② 董志凯主编：《中国共产党与156项工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两国关于“156项”的协商过程、“156项”最终确定下来的历史面貌。

近年来，地方党史研究系统也开始搜集、整理“156项”的资料，目前山西省党史研究部门已编研、出版了两部资料。一部是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的《奠基山西工业——“一五”时期山西十五项苏联援建工程》（上、下），搜集了“156项”中山西实施的15个建设项目的历史资料。^①另一部是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奠基太原工业：156项目在太原》，搜集了太原市“156项”的历史资料。^②这两部资料收集的政府文件、有关项目企业的档案资料、专题研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山西省“156项”的面貌。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组织编写大型丛书——《当代中国》时，有关部门在整理、编辑的本行业资料中，搜集了一些“156项”的资料，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在组织编写《当代中国的兵器工业》时，编辑整理了《中国军事工业历史资料丛书》18卷，分别为革命根据地兵器工业、清末至民国时期兵器工业、总册、航天、石油、航空、有色金属、轻工、中国科学院国防科技、纺织、建材、机械、兵器、核、电子、舰艇、冶金、化工，1993—1995年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属于内部资料，多为机密级，现存兵器工业档案馆。其他各卷，如《当代中国的煤炭工业》《当代中国的电力工业》《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等，在编写过程中，也搜集了大量本行业“156项”的资料，可惜没有出版资料集。

另外，一些“156项”企业也非常重视自己的厂志，组织编写了厂史、厂志等内部资料，如《秦川厂志》编写办公室编写了《秦川厂志（1953—1986）》，1988年内部印刷；国营第八〇五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写了《八〇五厂志（1953—1985）》第1卷，1988年内部印刷；国营南方动力机械公司编写了《国营南方动力机械公司史》《南方公司史》；株洲硬质合金厂编写了《株洲硬质合金厂》；株洲电厂编写了《株洲电厂志》。笔者推测，现存的“156项”企业应该都编写了厂志或厂史，只是没有出版发行。

二、“156项”确定与实施过程的研究

“156项”是如何确定与实施的？这是学界首先需要搞清的问题。

董志凯在《关于“156项”的确立》一文中，详细论述了“156项”确立的经过。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人已决定了从苏联引进资金与技术的方针，中国与苏联多次协商后，确定了苏联援建“156项”名单。“一五”计划颁布后“156项”有所变化，最终实施完成的“156项”实际是150个重点建设项目。论文分析了“156项”在中国工业化史上的意义，指出“156项”与中国独立完成的1000余个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相配套，使中国建立起崭新的工业体系，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论文还阐

^①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奠基山西工业——“一五”时期山西十五项苏联援建工程》（上、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② 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奠基太原工业：156项目在太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释了苏联对中国“无私援助”的确切内涵，指出苏联的援助使中国突破了西方敌对势力的封锁，获得了当时即使在苏联国内也是相当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苏联的低息贷款使资金极端短绌的新中国减少了利息负担。^①

董志凯、吴江的《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一书，更为详细地叙述了中国确定“156项”的国内外背景、“156项”的建设方针与投资体制、“156项”的确立过程、“156项”的资金来源、“156项”的实施过程、“156项”中的市场作用，以及“156项”的建设效益，等等。^②这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本研究“156项”的学术著作。

《当代中国》丛书之《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在论述20世纪50年代国家工业化基础建立的章节中叙述了“156项”，评价了“156项”发挥的重大作用。^③

还有一些著述研究了“156项”确立经过。宋凯扬的《“156项工程”建设回顾与思考》，叙述了“156项”的确定、实施过程及其意义。^④刘庆旻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156项建设工程》分析了“156项”在“一五”计划中的重要地位。^⑤刘振华的《建国初“156项”工程项目的确立》叙述了“156项”名单的变化情况。^⑥宋凤英的《奠基中国工业化基础的“156项工程”揭秘》叙述了毛泽东、周恩来到莫斯科与斯大林直接商定苏联援建中国的项目、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最终敲定“156项工程”的过程，肯定了苏联政府与苏联专家给予中国真诚的帮助。^⑦

“156项”是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史、工业化史、企业史、中苏关系史等领域不可逾越的问题，不少学者在其著述中均有所着墨。试举几例：董志凯、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3—1957）》简要论述了“156项”^⑧；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09）》讨论了“一五”计划与“156项”^⑨；贺耀敏、武力主编的《五十年国事纪要·经济卷》介绍了“156项”^⑩；高德步的《百年经济衰荣》叙述了“156项”^⑪；郭德宏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二卷）论述了“156项”的建设过程^⑫；韩岫岚主编的《中国企业史（现代卷）》概述了“156项”，逐一介绍了所涉及的行业发展情况^⑬。

① 董志凯：《关于“156项”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

② 董志凯、吴江：《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

③ 鼓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④ 宋凯扬：《“156项工程”建设回顾与思考》，《四川党史》1995年第5期。

⑤ 刘庆旻：《第一个五年计划与156项建设工程》，《文史精华》1999年第11期。

⑥ 刘振华：《建国初“156项”工程项目的确立》，《中国档案》2009年第3期。

⑦ 宋凤英：《奠基中国工业化基础的“156项工程”揭秘》，《党史博采（纪实）》2009年第12期。

⑧ 董志凯、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3—195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⑨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09）》，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

⑩ 贺耀敏、武力主编：《五十年国事纪要·经济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⑪ 高德步：《百年经济衰荣》，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⑫ 郭德宏主编：《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二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⑬ 韩岫岚主编：《中国企业史（现代卷）》，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

日本学术界十分关注中国“156项”。日本中国研究所于1953—1956年编的《中国经济年报（第1—12集）》，按照时间序列，详细列举了苏联援助的“156项”的相关资料。^①日本东亚经济研究会出版的《新中国的机械工业》，对“156项”的地理区位条件、建设实况、技术质量以及存在的问题等做了详细论述。地田诚、田尻利等的《中国工业的历史》对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历史做了总结，其中部分内容论及苏联援助的“156项”。^②

英美等国学者也关注中国“156项”，讨论中国的工业化、对外贸易特征、中苏关系等问题，下文详述。

三、“156项”与中国工业化的研究

“156项”在当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举世公认。已有的文献在研究“156项”与中国工业化的关系方面，集中讨论以下几个问题：一是“156项”在工业化中的重要作用；二是“156项”促进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巨大作用；三是“156项”的投资、资本形成；四是对于“156项”所涉及的企业、行业的研究。

1. “156项”在工业化中的重要作用

“156项”是当代中国工业化的开端，董志凯、吴江称之为“新中国工业的基石”，《新中国工业的基石——156项建设研究》一书分析了“156项”的行业分布情况，指出“156项”显著提高了中国工业生产能力。该书还研究了部分“156项”企业从建成到2000年前的发展情况，有力地说明了“156项”在中国工业中的重要意义。

陈夕的《156项工程与中国工业的现代化》一文，高度评价了“156项”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156项”是中国工业化历史上迈出的坚实一步。中国大规模地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促进了工业化，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步建成独立的工业体系。^③

唐艳艳的《“一五”时期“156项工程”的工业化效应分析》一文认为，“156项工程”建成后，工业生产能力获得巨大增长，为中国工业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156项工程”为中国的现代工业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经历的几次技术引进浪潮中，“156项工程”建设取得的效果是最好的，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④

一些论著叙述了“156项”在本行业发展中的奠基性作用。《当代中国》丛书的《当代中国的煤炭工

① 日本中国研究所编：《中国经济年报（第1—12集）》，东京：大月书店，1953—1956。

② 地田诚、田尻利等：《中国工业の歴史》，《東洋史研究》，1984，第199—205页。

③ 陈夕：《156项工程与中国工业的现代化》，《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

④ 唐艳艳：《“一五”时期“156项工程”的工业化效应分析》，《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

业》《当代中国的电力工业》《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当代中国的石油化学工业》《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当代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当代中国的化学工业》《当代中国的机械工业》《当代中国的医药事业》《当代中国的轻工业》《当代中国的航空工业》《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当代中国的船舶工业》《当代中国的兵器工业》等卷，分别叙述了“156项”在这些行业的基本情况及其作用。^①

Asbjorn Lovbrak 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也存在问题，如伤害了轻工业和手工业，重工业和农业的冲突也在加剧。另外，在这些企业内部，苏联一言堂式的工厂管理模式、苏联技术人员和中国技术人员的巨大收入差距，也对中国这些关键的经济部门带来了较为不利的影响。^②

另外，一些学位论文着眼于“156项”的实施，研究了东北工业发展情况，如王维德的《1949—1976年吉林省重工业的发展历程及启示》、王玉芹的《建国初期东北重工业发展状况评析》。^③

2. “156项”促进中国工业技术的巨大进步

胡伟、陈竹的《156项工程：中国工业化的起点与当代启示》一文，总结与梳理了中国工业化发展初期“156项”的历史经验，认为“156项”是中国工业化快速向前推进的起点，也是中国首次借助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历史性实践。中国工业技术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奠定了工业全面发展的坚实基础。^④

张久春的《20世纪50年代工业建设“156项工程”研究》一文，分析了苏联向中国转移工程建设与技术的特点，认为“156项”工程帮助新中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初步基础，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现代技术体系。^⑤

张柏春、姚芳、张久春等的《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一书，详细论述了在实施“156项”工程中，苏联向中国转移的先进技术情况，分析了苏联技术对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作用。^⑥

张培富、孙磊的《156项工程与1950年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认为，通过“156项”工程，中国成规

① 张明理主编：《当代中国的煤炭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张彬主编：《当代中国的电力工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焦力人主编：《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张万欣主编：《当代中国的石油化学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周传典主编：《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刘学新主编：《当代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杨光启主编：《当代中国的化学工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景晓村主编：《当代中国的机械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齐谋甲主编：《当代中国的医药事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王毅之主编：《当代中国的轻工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段子俊主编：《当代中国的航空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刘寅主编：《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程望主编：《当代中国的船舶工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王立主编：《当代中国的兵器工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② Asbjorn Lovbrak.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76, 13 (3): 207-226.

③ 王维德：《1949—1976年吉林省重工业的发展历程及启示》，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王玉芹：《建国初期东北重工业发展状况评析》，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④ 胡伟、陈竹：《156项工程：中国工业化的起点与当代启示》，《工业经济论坛》2018年第3期。

⑤ 张久春：《20世纪50年代工业建设“156项工程”研究》，《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09年第3期。

⑥ 张柏春、姚芳、张久春，等：《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模地转移了苏联工业领域特别是重工业领域的技术，由此奠定了新中国工业技术的基础，中国工业领域科技水平，如工业设计技术、工业制造技术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苏联将工业技术以国际技术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转移至中国，提高了中国的科学技术综合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新中国的科技体制，特别是工业技术体制。^①

王奇的《“156项工程”与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评析》认为，以“156项”为核心的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旧中国100年的发展水平，同欧美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毫不逊色，使得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从新中国成立前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半个世纪，迅速提高到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②

Alexander Eckstein 研究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贸易问题，认为中国从苏联进口的机器设备、石油及其产品、金属及其矿石等急需的工业产品非常重要，使中国从农业社会跃进到了工业社会。中国向苏联出口了大量的大豆、原材料、食物、金属、纺织品、服装。这种贸易模式反映了中国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③

3. “156项”的投资、资本形成

William W. Hollister 分析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资本形成问题，认为中国通过实施“156项”，在苏联的帮助下建成了很多新的工业行业，提高了工业产品质量和工业生产能力，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管理者、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数量远远跟不上工业发展需要，并且农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过快。^④

唐艳艳的《“156项工程”建设中政府主导资本形成得失评析》一文认为，当时政府采取计划管理的办法主导资本形成，主要通过增加国营工商业的收入、对私营工商业的税收、增加农业剩余、发行政府公债和提高社会储蓄、寻求其他国家的援助等五个方面来形成资本。该文进而分析了“156项”中政府主导资本形成的得失。^⑤

Ajit Singn 认为，1950—1957年中国通过“156项”建设，从苏联得到了重要的援助和资本输入，不仅带来了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基础。从1958年起，中国成了净资本输出国，靠自己的努力，在没有任何外国援助，还要偿债的情况下经济继续发展。并且这些重点项目的建设，使中央政府得以直接掌控国家的经济命脉，尤其是现代工业部门。^⑥

① 张培富、孙磊：《156项工程与1950年代中国的科技发展》，《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② 王奇：《“156项工程”与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③ Eckstein A. *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Foreign Trade: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1966.

④ Hollister W W. Capital form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964, (17): 39-55.

⑤ 唐艳艳：《“156项工程”建设中政府主导资本形成得失评析》，《理论月刊》2010年第4期。

⑥ Ajit Singn.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1949.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973, 8 (47): 24.

Louis Putterman & Xiaoyuan Dong 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劳动就业与效率问题时指出, 当时中国国有企业实行低工资政策, 国家对农产品实行低价强制收购政策, 增加了国家储蓄率, 这些积累被用于优先支持的工业产业投资和债务偿还, 这些积累和苏联的援助同等重要。^①

William C. Kirby 认为, “156 项”建设计划是民国时期经济计划的延续, 这一观点虽然值得商榷, 但也反映出历史相似性。他比较了 1943—1958 年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经济计划, 认为与民国时期一样, “一五”时期中国政府优先投资于那些大型的、资本密集型的、和国防有关的重工业制造企业。这些建设项目, 尤其是在东北的很多项目, 实际上早在 1949 年之前就已经被列入当时政府的筹划蓝图了。另外, 和民国时期一样, 这些项目采取以货偿债的方式寻找外部投资。中苏之间巨额贸易的相关协议, 成为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部分。^②

Joel Glassman 探讨了“156 项”对于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因为大型工厂需要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才, 所以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 降低了对普通、基础教育的投入。但盲目扩张高等教育, 导致城市人口大量增加, 失业变得越来越严重, 后来中国一些人才政策被迫调整, 如下放职工。^③

4. “156 项”所涉及的企业、行业的研究

D. J. Dwyer 的文章着重研究了中国煤炭工业的发展, 他认为煤炭工业在“156 项”中占有重要地位, 苏联为中国煤矿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现代化、机械化的勘探、采洗设备和生产线, 苏联专家的指导为引进新技术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中国培养了大量技术工人。这些煤炭工业企业通过铁路与钢铁工业重镇相连, 共同驱动了工业生产基地的形成和发展。^④

陆建华的《影响深远的苏联“156”项援建》一文, 重点论述了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建设过程, 指出苏联技术和苏联模式的技术体系比较迅速地提升了中国的技术、科学和教育的水平, 在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⑤

近年来, 一些学位论文也关注“156 项”中企业与行业的发展情况, 如祁宁宁的《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上海迁兰企业研究》分析了上海迁往兰州的“156 项”企业的建设与发展情况^⑥; 邱成岭的《苏联援建包头钢铁基地史略》论述了包头钢铁基地的建设^⑦; 赵世磊的《国营华北制药厂研究 (1953—1965)》探

① Putterman L, Dong X Y.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ir role, job creation and efficiency in long-term perspective. *Modern China*, 2000, 26 (4): 403-447.

② Kirby W C.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 Economic planning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1943-1958.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90, (24): 121-141.

③ Glassman J. Educational reform and manpower policy in China, 1955-1958. *Modern China*, 1977, 3 (3): 259-290.

④ Dwyer D J. The coal industry in Mainland China since 1949.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963, 129 (3): 329-338.

⑤ 陆建华:《影响深远的苏联“156”项援建》,《装备制造》2008 年第 Z1 期。

⑥ 祁宁宁:《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上海迁兰企业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⑦ 邱成岭:《苏联援建包头钢铁基地史略》,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讨了华北制药厂的建立与发展^①。

四、“156项”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

“156项”的布局考虑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问题，150个建设项目分布于东北、华北、西北、中南等17个省、自治区，这些建设项目与后来所在地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董志凯、吴江的《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一书，非常详细地叙述了150个建设项目在17个省、自治区的分布情况。

“156项”分布在17个省区市，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代中国”丛书的《当代中国的安徽》《当代中国的北京》《当代中国的河北》《当代中国的黑龙江》《当代中国的湖北》《当代中国的湖南》《当代中国的吉林》《当代中国的山西》《当代中国的河南》《当代中国的江西》《当代中国的陕西》《当代中国的甘肃》《当代中国的内蒙古》《当代中国的云南》《当代中国的新疆》等卷，分别叙述了“156项”对本省区市经济的促进作用。^②

唐艳艳的《“一五”时期“156项工程”的工业化效应分析》一文认为，“156项工程”初步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③

Nai-Ruenn Chen认为，1949年之前，中国77%的工业总产值集中在沿海地区，而“156项”有55%的投资和3/4的新厂房建设集中在内陆地区，促进了这些落后地区较快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工业的空间分布从此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些内陆地区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只是因为基数比较小，这些地区依然要花很长时间才可能赶上那些发展速度较慢的发达省份。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工业发展布局和20世纪50年代早期相比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④

“156项”促进了工业城市的兴起。

何一民、周明长认为，“156项”的启动，不仅改变了中国城市发展的道路、方向，而且为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从而推动了中国城市进入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导向的新阶段。在这

① 赵世磊：《国营华北制药厂研究（1953—1965）》，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② 苏桦主编：《当代中国的安徽》，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范瑾主编：《当代中国的北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解峰主编：《当代中国的河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陈雷主编：《当代中国的黑龙江》，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钱运录主编：《当代中国的湖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刘正主编：《当代中国的湖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刘敬之主编：《当代中国的吉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李立功主编：《当代中国的山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张树德主编：《当代中国的河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傅雨田主编：《当代中国的江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白文华主编：《当代中国的陕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刘毓汉主编：《当代中国的甘肃》，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王铎主编：《当代中国的内蒙古》，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高治国主编：《当代中国的云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富文主编：《当代中国的新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③ 唐艳艳：《“一五”时期“156项工程”的工业化效应分析》，《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

④ Chen N 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1975, 2 (5): 276-294.

一发展模式的作用下，中国城市的发展呈现出城市职能经济化、城市化发展高速化、大中城市优先发展以及区域城市发展均衡化等新特点，这种城市发展的变化既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城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又为后来中国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全新的基础。^①他们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156项”的分布重构了新中国工业化区域，促使多类型工业城市群体的兴起，中国正式揭开了有序建设和重点发展现代化工业城市的新篇章，形成了围绕“156项”及“694项”重点工业项目建设的工业城市导向的城市建设新模式。^②

李百浩、彭秀涛和黄立从“156项”的视角，分析了新兴工业城市的发展目标、类型与建设发展模式，阐述了新兴工业城市规划的本质与作用。^③

胡伟、陈竹的《156项工程：中国工业化的起点与当代启示》一文认为，156项工程实施后，新城市不断涌现，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促进了城市发展。工业建设地区分布趋向合理，促进了区域均衡发展。^④

Asbjorn Lovbrak认为，“156项”主要分布在东北等地的内陆地区，而且是建设大型重工业企业，促进了一批工业城市的优先发展。^⑤

杨晓的硕士学位论文《兰州重工业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研究（1949—1978）》一文，分析了“156项”在兰州重工业城市发展中的作用。^⑥

五、“156项”与中苏关系的研究

“156项”是在苏联援助下进行的，“156项”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影响。

王奇的《“156项工程”与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评析》指出，“156项”建设工程的实施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雏形注入了苏式基因，中国从此开始仿效苏联经济模式，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苏联一样，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此战略具有资本密度大、技术含量高、建设周期长的特点，需要巨额投资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除了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启动、组织整个工业化的进程。“156项”的实施，加速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公有化、计划化的进程。^⑦

Alexander Eckstein认为“156项”使中苏之间成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资本品（capital goods）进口迅速增加，成了苏联最主要的工业品和工业生产线出口国。^⑧

沈志华、李丹慧（Shen Z H & Li D H）认为，通过实施“156项”，苏联以其工业品、专业技术改变

① 何一民、周明长：《156项工程与新中国工业城市发展（1949—1957）》，《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② 何一民、周明长：《156项工程与中国工业城市的新生》，《中国城市经济》2009年第9期。

③ 李百浩、彭秀涛、黄立：《中国现代新兴工业城市规划的历史研究——以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城市规划学刊》2006年第4期。

④ 胡伟、陈竹：《156项工程：中国工业化的起点与当代启示》，《工业经济论坛》2018年第3期。

⑤ Lovbrak A.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76, 13 (3): 207-226.

⑥ 杨晓：《兰州重工业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研究（1949—1978）》，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⑦ 王奇：《“156项工程”与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⑧ Eckstein A. *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Foreign Trade: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1966.

了中国经济，这些项目也是苏联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强有力手段。^①

日本学界也关注“156项”与中苏关系。

ジョセフ・S.バーリナー 著、小浪充译的《ソ連の經濟援助：低開發諸国における新しい援助および貿易政策》，主要分析了苏联对中国等欠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政治经济目的。^②

シドニー・クライン 著、気賀健三译的《中ソ分裂の經濟的背景（時事新書）》，通过分析苏联援助中国项目的变化，讨论了中苏关系分裂的经济背景和后果。^③

张国良的博士论文《中国東北地域の經濟發展に関する研究：植民地期・共和国前期・改革開放期を中心に》讨论了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援助和东北工业化发展的关系。^④

日本亚东文化研究会亚东资料部编的《东亚资料（1952—1953年）》，比较详细地收录了苏联援助的中国各工业行业的资料。

日本中国研究所编的《图解中国经济》，对不同区域的苏联援助的“156项”的情况做了分析。

另外，一些学者研究了中共领导人对“156项”的贡献，如米镇波的《周恩来为争取156项大型建设项目所开展的对苏外交》^⑤；熊亮华的《陈云与“一五六项工程”》^⑥；杨基龙的《李富春与一五六项工程》^⑦。上述文章论述了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新中国领导人对“156项”的卓越贡献。

六、“156项”研究状况简评

第一，“156项”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

首先，学术界整理、出版了“156项”的基础资料。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编辑出版了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国家部委有关“156项”的档案材料；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整理出版了山西省15项建设工程的历史资料；国防科工委组织力量整理了“156项”军工企业的历史资料；许多“156项”企业编写了厂志、厂史；等等这些都为深入研究“156项”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其次，学术界对于“156项”做了多角度的研究。学者对“156项”确定、实施及其影响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对“156项”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做了研究；对“156项”所代表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做了研究；对“156项”在中国工业基地建设、工业城市建设方面的贡献做了研究；对“156项”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促进作用做了研究；对“156项”在各行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做了分

① Shen Z H, Li D H. *After leaning to one side: China and its allies in the Cold War*,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② ジョセフ・S.バーリナー：《ソ連の經濟援助：低開發諸国における新しい援助および貿易政策》，小浪充译，日本外政学会，1991。

③ シドニー・クライン：《中ソ分裂の經濟的背景（時事新書）》，気賀健三译，时事通信社，1967。

④ 张国良：《中国東北地域の經濟發展に関する研究：植民地期・共和国前期・改革開放期を中心に》，新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

⑤ 米镇波：《周恩来为争取156项大型建设项目所开展的对苏外交》，《南开学报》1998年第2期。

⑥ 熊亮华：《陈云与“一五六项工程”》，《湘潮》2007年第11期。

⑦ 杨基龙：《李富春与一五六项工程》，《湘潮》1992年第7期。

析；对“156项”与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做了探讨。一些研究成果已成为研究“156项”必备的参考文献。

第二，“156项”研究仍很薄弱。

其一，整理、出版的“156项”的资料十分稀缺。从目前已出版的资料看，“156项”专题资料仍然很少，可以利用的仅有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学者选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各卷收录的部分材料，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山西省15项苏联援建工程的历史资料、一些企业的厂志等。国防科工委组织编写的军工企业史料多处于保密状态，难以利用。“156项”建设完成的有150项，每个项目都应该有比较详细的历史资料。因此，已出版的史料可以说只是九牛一毛。

其二，对于“156项”的研究十分不足。目前，学术界对于“156项”的研究只出版了一部学术专著。学者发表的主题为“156项”重点建设项目论文也仅有三四十篇。虽然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156项”，但其数量少，且普遍缺乏分析深度。

其三，对于“156项”相关企业、行业发展情况的研究十分缺乏。现存的不少企业仍然是本行业的重要厂家，但缺乏相关研究。

其四，“156项”研究方法比较陈旧。已有的研究成果多使用历史学的叙事方法，较多讨论“156项”的建设过程，而缺乏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进行比较深入的学理性研究。

其五，在“156项”的研究上，视野不够开阔。已有的研究文献多是关注“156项”本身的研究，较少将“156项”放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展开分析，较少将“156项”放在中国技术进步进程中展开分析，较少将“156项”放在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中展开分析，较少将“156项”放在全球经济史的框架中进行分析。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术界对“156项”的研究比较薄弱，已有的文献资料仅反映了“156项”与企业发展变迁的一鳞半爪，研究深度远远不足。

七、“156项”研究展望

第一，搜集、整理“156项”历史资料是必须做的前期工作，且大有可为。一是涉及“156项”的政府部门档案资料极其丰富，尚待搜集、整理。二是相关企业众多，企业的发展资料尚待搜集、整理、开发与研究。

第二，“156项”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奠基作用需要进行深入研究。“156项”对中国技术引进、资金引进、管理制度引进、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影响，乃至对中国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建设、国民经济体系建设的影响，都可以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

第三，“156项”对中国工业布局的影响有待进行深入研究。“156项”实施后，中国内陆地区兴建起一批工业基地，改变了近代形成的现代工业偏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格局。可以对“156项”与工业基

地的形成关系进行深入研究。通过研究中国工业布局的变迁，进而深入研究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产力布局的深度调整。

第四，“156 项”对各行业发展的影响有待进行深入研究。“156 项”涉及 14 个行业，而对于“156 项”在各行业发展中作用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特别是对于“156 项”中重要企业发展变迁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第五，“156 项”对中国工业城市兴起的影响有待进行深入研究。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发表了一些文章，但总体上不够深入，可以进一步深化。

第六，“156 项”重点建设项目与国家治理体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值得深入进行。

（编辑：耿雪）

科学出版社